

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考察

——来自 2015—2023 年全国 125 个脱贫县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

蒋 炜 杨 阳 徐 舒 仇童伟

摘要：确保农村人口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强化对有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的开发式帮扶是实施分层分类帮扶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脱贫攻坚战结束当年就业帮扶资金投入变动这一外生冲击，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帮扶显著促进了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就业帮扶可通过就业帮扶的稳定性和开发性来提高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越好。而且，第三产业发展是提升就业帮扶政策效果的重要助力。在就业帮扶的具体措施中，仅有提供公益岗位展现出显著的增收效应。同时，就业帮扶表现出良好的政策瞄准性。因此，需要通过强化帮扶对象返贫致贫动态监测与帮扶并举、建立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地实施就业帮扶等方式，释放就业帮扶等举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潜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农民增收 就业帮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乡村全面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2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①。自 2020 年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就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2021 年印发的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收入稳定性监测及增收长效机制研究”（编号：23&ZD116）。

〔作者信息〕 蒋炜，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jwuniversity@163.com；杨阳，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监测中心，电子邮箱：cufe_yangyang@163.com；徐舒，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xushu@swufe.edu.cn；仇童伟（通讯作者），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15150561782@163.com。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58.htm。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优化产业就业等发展类政策”“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①。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②。就业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治本之策之一，需要“扎实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收入保持稳定”^③。

事实上，就业帮扶一直是中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举措。相关研究指出，就业是增强脱贫人口发展动力的内生源泉，是防止返贫的关键举措（张鹏龙等，2024）。平卫英等（2020）的研究表明，就业培训对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明显优于传统农业劳动。与单纯的受教育水平提升相比，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正向作用更大，表明具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增收脱贫的关键（赵海，2013）。此外，无论是本地非农就业，还是外出务工，均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其中，本地非农就业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韩佳丽，2019）。换言之，加大就业帮扶力度，不仅是激发地方就业潜力、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帮助脱贫人口增收、有效防止返贫的核心手段。然而，殷江滨等（2021）发现，初始就业水平会对非农就业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反映出脱贫地区就业增加的内生动力不足，若无就业帮扶难以破解就业困境。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会提高就业的脆弱性。如果非农就业减少，脱贫家庭的收入就可能下降，返贫风险也会提高（岳希明和罗楚亮，2010）。通过非农就业来增加工资性收入是脱贫人口增收的主要方式，且重要性持续上升。2015—2023 年农业农村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已从 2015 年的 51.73% 增至 2023 年的 73.25%。在这样的情况下，揭示就业帮扶政策的效果及其优化路径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后扶贫时代就业帮扶能否持续产生预期效果，需要关注其稳定性和开发性。然而，关注就业帮扶的政策效能及其优化路径的研究较少，且大多基于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并以短期评估为主，样本范围较小（平卫英等，2020；张鹏龙等，2024）。同时，现有研究缺乏对就业帮扶稳定性和开发性的系统性探讨。这些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难以全面揭示就业帮扶的整体效果；第二，难以识别 2015 年以来就业帮扶政策的效能及其存在的不足；第三，难以为过渡期后持续优化就业帮扶政策提供明确且有效的建议。

因此，本文首先利用 2015—2023 年信息系统抽样数据，根据财政资金投入的变化来建立强度 DID 模型，评估就业帮扶政策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其次从稳定性和开发性两个维度，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3/22/content_5594969.htm。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2258.htm。

^③ 《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http://www.qstheory.cn/20250228/90932509ed2b45d2a94effbf1f5df8f3/c.html>。

系统考察就业帮扶政策影响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内在机制；最后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情景，评估就业帮扶政策的异质性增收效应，为优化政策设计提供思路。本文主要贡献包括：第一，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变化识别就业帮扶政策的增收效应，为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第二，基于 2015—2023 年数据，系统剖析脱贫攻坚以来就业帮扶政策的效果及其面临的挑战，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优化后续政策提供针对性建议和理论支持。

二、特征事实与分析框架

（一）特征事实

1. 中国就业帮扶政策的实施状况。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之一。为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能够帮助困难群体稳定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促进可持续脱贫（平卫英等，2021）。2018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力推进就业扶贫”“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脱贫覆盖面”^①。2025 年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进一步提出，“强化农民增收举措。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政策和权益保障机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②。

表 1 展示了 125 个脱贫县在 2015—2023 年的就业帮扶投入规模及其占县域总帮扶投入的比重（以下简称“投入占比”）的均值^③。统计结果显示：2015—2016 年，就业帮扶投入的平均规模从 914 万元下降到 833 万元，其投入占比从 30.48% 下降到 7.82%。其原因是：2015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加大财政扶贫总体投入力度，并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倾斜。受此影响，就业帮扶投入占比大幅下降，但是绝对规模变化不大。2016—2020 年，就业帮扶投入的平均规模从 833 万元增至 2447 万元，其投入占比从 7.82% 增至 11.87%。2020—2023 年，就业帮扶投入的平均规模从 2447 万元下降到 338 万元，其投入占比从 11.87% 增加到 16.47%。这一变化主要源于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地方政府对帮扶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一方面，随着贫困人口基本稳定脱贫，对其直接性的资金支持逐步减少；另一方面，资金配置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倾斜，更加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表 1		125 个脱贫县在 2015—2023 年的年均就业帮扶投入								
指标		各年份的就业帮扶投入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就业帮扶投入规模（万元）		914	833	1234	1886	1886	2447	897	613	338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17095.htm。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3.htm。

^③ 本文重点关注扶贫资金，因此文中就业帮扶投入资金在 2020 年及之前为扶贫资金，在 2020 年后为地方政府自主安排的地方财政专项资金，不包含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表1 (续)

就业帮扶投入占比 (%)	30.48	7.82	9.25	9.93	11.39	11.87	10.74	11.07	16.47
--------------	-------	------	------	------	-------	-------	-------	-------	-------

注：根据信息系统中125个脱贫县在2015—2023年的观测数据测算得到。

2.样本脱贫县在2015—2023年的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变动趋势。在就业帮扶政策的影响下，帮扶对象的增收状况到底如何？2015—2023年，125个脱贫县的帮扶对象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均值从6969元增加到12049元，但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从39.00%下降到18.43%；工资性收入的均值从9243元增加到47887元，相应比重从51.73%增加至73.25%；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均值分别从339元和1316元增加到669元和4770元，相应比重分别从1.90%和7.37%变化为1.02%和7.30%^①。这意味着，帮扶对象对经营性收入的依赖程度显著下降。同时，工资性收入占主导，且重要性持续提高，凸显就业在脱贫增收中的关键作用。黄一诺等（2022）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3.样本脱贫县在2015—2023年的帮扶对象返贫致贫原因的变化趋势。在致贫因素中，疾病、缺技术、残疾、缺资金是最主要的致贫类型。2015—2020年，残疾致贫的比重呈现增加态势；缺技术致贫的比重也呈现增加趋势；相反，缺劳力和缺资金致贫的比重有所下降；缺土地等资源和交通条件落后致贫的比重变化不大^②。这说明，疾病、残疾等因素确实是帮扶对象致贫的关键原因，兜底线的保障举措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切实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不致贫。

根据表2，在返贫因素中，疾病、缺资金、残疾、缺劳力、自然灾害和教育负担是主要的返贫类型。其中，疾病、自然灾害和教育负担返贫的比重逐步下降，说明兜底性社会保障和教育帮扶等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残疾返贫的比重增加，说明需要提升帮扶政策的及时性，切实加强对突发风险的防控。另外，因缺技术、缺劳力和缺资金而返贫的比重有所上升。因此，应当强化为有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提供技能培训和小额贷款支持等帮扶政策，以增强帮扶对象自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内生动力。

表2

2015—2020年帮扶对象返贫原因的变化趋势

单位：%

返贫原因	不同年份返贫原因占比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疾病	53.29	38.71	41.68	42.04	41.62	41.67
自然灾害	12.75	5.59	6.25	6.64	6.75	6.84
残疾	7.88	7.85	8.09	8.39	8.38	8.34
教育负担	7.05	7.31	6.78	6.69	6.87	6.85
缺资金	5.96	13.18	11.93	11.10	11.00	11.03
缺技术	4.68	8.02	6.54	6.63	6.80	6.80
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3.67	5.90	5.19	4.96	5.06	5.02

^①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1。

^②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2。

表 2（续）

缺劳力	3.11	7.57	7.36	7.45	7.33	7.25
缺土地	0.79	0.77	0.78	0.72	0.73	0.74
交通条件落后	0.55	4.56	4.89	4.76	4.81	4.81
产业扶贫失败	0.12	0.24	0.27	0.36	0.39	0.39
缺水	0.09	0.20	0.16	0.16	0.16	0.16
婚姻	0.06	0.10	0.08	0.10	0.10	0.10

注：根据信息系统中 125 个脱贫县在 2015—2020 年的观测数据测算得到。

（二）分析框架

非农就业收入是衡量帮扶对象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脱贫的重要指标之一（黄薇和曹杨，2022）。稳定的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强脱贫户的经济独立性，降低其对外部扶持的依赖，从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平卫英等（2021）指出，推进非农就业，就业帮扶成为关键举措之一。就业帮扶主要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等方式，提高脱贫户的就业能力，使其获得稳定的非农就业收入。因此，工资性收入作为直接依赖就业的收入类型，最能体现就业帮扶政策的效果。同时，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与家庭的非农就业无直接关联，所以就业帮扶对这些类型收入的影响较为有限：经营性收入主要依赖生产资料投入、市场环境和农户经营能力；财产性收入来源于房产、股权、存款利息等资产收益；转移性收入主要指政府补贴和社会救助。换言之，就业帮扶的关键作用在于提高非农劳动收入，而非直接改善家庭的生产、财产或社会福利状况（张世伟和张君凯，2020；黄一诺等，2022）。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H1：就业帮扶会增加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但对其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作用比较有限。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稳定性是决定帮扶对象能否长期稳定脱贫的基础，开发性则是决定帮扶对象能否自力更生、脱离依赖困境的核心。就业帮扶的稳定性体现在稳定帮扶对象的经济基础，避免其收入出现剧烈或不可预测的波动。稳定性是就业帮扶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衡量其成效的关键指标（刘天平等，2024）。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举措，就业帮扶能够有效提升帮扶对象的抗风险能力，以确保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收入相对稳定。陈菲菲等（2022）研究发现，稳定就业是保障易地搬迁人口融入新环境并实现平稳过渡的关键，为易地搬迁人口在搬迁地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郭倩等（2021）指出，在防止返贫致贫的各种机制中，就业帮扶的作用最强，已成为防止返贫致贫的重点。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稳定性是就业帮扶提升帮扶对象工资性收入的作用机制之一。

就业帮扶的开发性体现在帮扶对象自主实现脱贫增收，摆脱对外部救助的依赖。韩华为（2019）指出，农村低保等兜底扶贫政策投入过多会引致福利依赖，造成政府和社会负担加重以及资源非效率配置，影响扶贫开发政策效果的持续性。肖萌和李飞跃（2017）指出，福利依赖现象并非源于就业积极性低下，而是来自就业能力不足和就业机会匮乏。换言之，摆脱外部依赖、实现自主脱贫增收的关键在于提升帮扶对象的就业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就业帮扶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等方式激发帮扶对象的自我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对接和企业带动等方式为帮扶对象提供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帮扶对象实现非农就业，提升其增收的自主性（平卫英等，2021）。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H3：开发性是就业帮扶提升帮扶对象工资性收入的作用机制之一。

然而，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可能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林嵩等，2023）。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帮扶对象的就业机会往往越少。就业帮扶能够为市场注入活力，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从而帮助帮扶对象实现就业增收。龚沁宜和成学真（2018）、陈慧卿等（2021）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就业帮扶的效果越显著。其次，产业结构决定了当地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能够创造大量低技能门槛的就业岗位，更能满足帮扶对象的就业需求，直接带动他们的就业和增收（张萃，2011；单德朋，2012）。换言之，地区经济特征及其产业结构是就业帮扶作用发挥的重要情景约束，也是就业帮扶政策优化需要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H4：就业帮扶对帮扶对象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特征的异质性。

图1呈现了就业帮扶政策与帮扶对象家庭收入关系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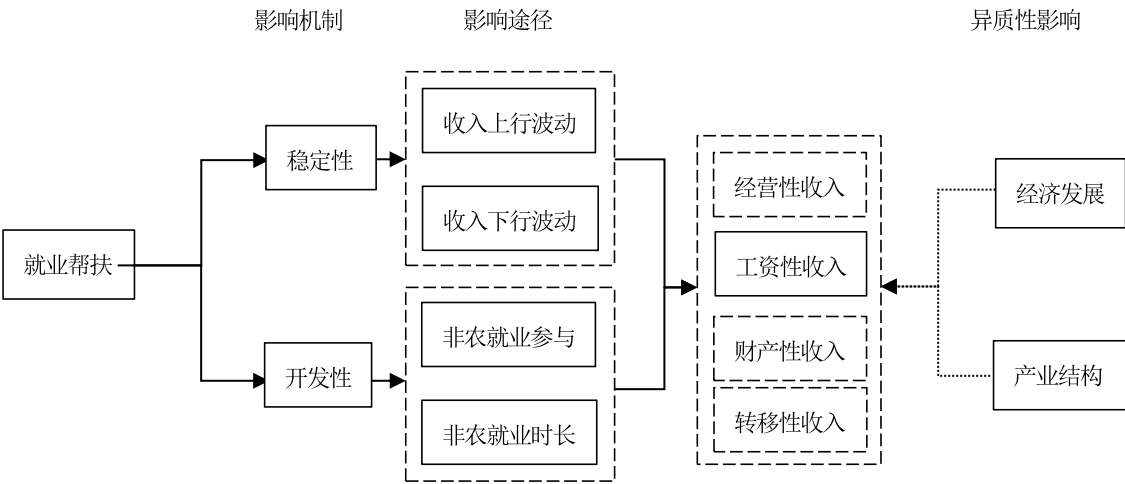


图1 就业帮扶影响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信息系统^①是一个集贫困人口信息采集、致贫原因分析、贫困防治政策落实、贫困人口脱贫情况跟踪、脱贫人口返贫预警等功能于一体的系统，旨在全面、精准地服务新时代的农村发展目标实现。信息系统是为适

^①为了表述简便，后文使用前文定义的简称。

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需求，升级改版原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而形成的。信息系统数据的来源多样，涵盖基层采集、部门共享、预警机制、线上录入、历史数据整合以及群众反馈等多个渠道。经过清洗的信息系统数据，不仅为精准监测和帮扶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为评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全面、精准的事实支持和决策依据。本文所使用的信息系统数据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帮扶项目数据，包括通过抽样而来的 125 个脱贫县的帮扶项目类型、资金金额等信息。具体而言，帮扶项目分为产业项目、就业项目、易地搬迁项目等，本文主要使用就业帮扶项目的相关数据。第二，125 个脱贫县的原贫困户和脱贫户数据，包括家庭和成员两个层次数据。其中，家庭层面数据包括家庭收入、人口数、耕地面积、主要致贫原因和返贫原因等；成员层面数据包括成员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务工时间等。在时间维度上，现有信息系统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2015—2023 年。

本文的地区宏观数据来源于 2016—2023 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本文使用的是 2015—2022 年的县级数据，包括地区生产总值、户籍人口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等。

为确保研究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由于县级数据的保密性和产权问题，课题组仅被允许使用信息系统中 125 个脱贫县的数据。在抽样方面，课题组首先以各省份原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为权重，计算从各省份抽取的样本县数。随后，在各省份内部再以各脱贫县的脱贫人口数为权重，进行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在数据处理方面，保留了原贫困户和脱贫户的数据，并删除了家庭收入数据缺失的样本，同时删除了户主、家庭和县域层面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涵盖 125 个脱贫县的 18565205 户农户。由于部分核心变量存在数据缺失问题，因此，后文的模型估计会出现样本量不一致的情况。

（二）变量选择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帮扶对象的家庭收入，包括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在基准回归识别就业帮扶对四类收入的影响后，后文将聚焦于就业帮扶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

2. 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就业帮扶冲击。本文将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结束当年就业帮扶资金的剧烈变动视为冲击，构建就业帮扶的强度双重差分（DID）变量，即时间虚拟变量和冲击指标的交互项。其中，时间虚拟变量在 2020 年及之后取值为 1，在 2020 年之前取值为 0。冲击指标的构建公式如下：

$$Shock_c = \frac{Expen_{c,2020-2023}}{Rev_{c,2020-2022}} - \frac{Expen_{c,2015-2019}}{Rev_{c,2015-2019}} \quad (1)$$

（1）式中： $Expen_{c,2020-2023}$ 和 $Expen_{c,2015-2019}$ 分别为 c 县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和之前的年均就业帮扶资金， $Rev_{c,2020-2022}$ 和 $Rev_{c,2015-2019}$ 分别为 c 县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和之前的年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若冲击指标大于零，则说明地方政府加大了就业帮扶的投入力度；若该指标小于零，则说明地方政府降低了就业帮扶的投入力度。

图2展示了冲击指标分组下就业帮扶资金投入情况。图2显示，不同分组的就业帮扶资金投入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冲击指标大于0的地区在2020年加大了就业帮扶资金投入，政策实施力度较大；冲击指标小于0的地区则在2020年之前就逐步减少了就业帮扶资金投入，在脱贫攻坚后期降低了就业帮扶的资金投入力度。这种资金投入趋势的差异，为本文采用强度双重差分（DID）方法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条件。强度DID方法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政策冲击的强度差异，对比分析具有相似特征但受冲击影响程度不同的地区差异，从而更精准地识别政策冲击的真实效果。本文通过比较冲击指标大于0和小于0的地区在就业帮扶效果上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因素的干扰，从而实现较为外生且更为准确的就业帮扶增收效应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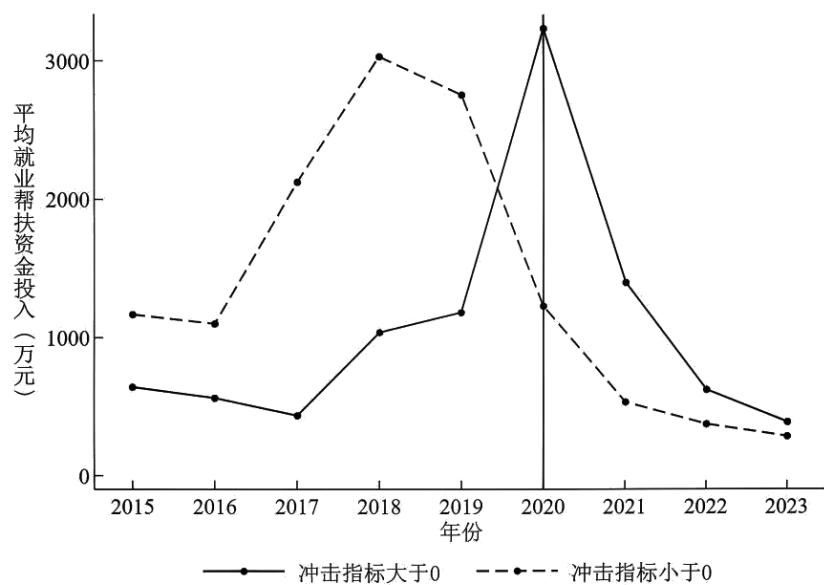


图2 冲击指标分组下就业帮扶资金投入情况

3.控制变量。为避免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潜在干扰，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钱忠好和王兴稳，2016；谢先雄等，2020；孙顶强等，2024），引入户主、家庭和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文化程度和户主健康状况。年龄与收入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闵继胜和陈靖雯，2024），因此，本文引入户主年龄的平方项（除以100）。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和家庭耕地面积。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县域户籍人口数、县域第二产业占比、县域第三产业占比、县域财政自给率、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县域产业规模化、县域储蓄水平、县域社会福利水平和县域教育水平。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人均经营性收入	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元）	2053.432	3547.998
	人均财产性收入	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元）	267.082	871.243
	人均工资性收入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元）	5146.406	5673.096
	人均转移性收入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元）	1864.306	2473.568

表3（续）

自变量	就业帮扶冲击	时间虚拟变量和冲击指标的交互项	-0.005	0.046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家庭户主年龄（岁）	54.880	13.547
	户主年龄平方	家庭户主年龄的平方除以 100	31.953	15.379
	户主性别	女性=1；男性=0	0.140	0.347
	户主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上=6；大专=5；高中=4；初中=3；小学=2；文盲或半文盲=1	2.275	0.728
	户主健康状况	健康=1；患有长期慢性病、大病或残疾=0	0.654	0.476
	家庭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3.599	1.788
	家庭耕地面积	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亩）	5.726	6.853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671797	1223845
	县域户籍人口数	县域户籍人口数（万人）	79.158	53.226
	县域第二产业占比	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0.323	0.126
	县域第三产业占比	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0.441	0.105
	县域财政自给率	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	0.174	0.094
	县域金融发展水平	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0.846	0.384
	县域产业规模化	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64.919	60.180
	县域储蓄水平	县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1526682	1149669
	县域社会福利水平	县域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床）	2043.540	2297.635
	县域教育水平	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占县域户籍人口数的比重	0.052	0.013

注：4 个因变量、家庭耕地面积、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县域户籍人口数、县域产业规模化、县域储蓄水平、县域社会福利水平在后续回归中取对数。

（三）模型选择

本文旨在探究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利用强度 DID 方法识别就业帮扶冲击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 Y_{it} = \beta_0 + \beta_1 Post_t \times Shock_c + \mathbf{X}'\boldsymbol{\gamma} + \alpha_i + \theta_t + \varphi_{p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 i 、 c 、 p 和 t 分别代表家庭、县级行政区、省份和年份。 Y_{it} 表示家庭人均收入，包括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 $Post_t$ 为时间虚拟变量，在 2020 年及之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Shock_c$ 为本文构建的冲击指标。 $\mathbf{X}$ 为户主、家庭和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 α_i 为家庭固定效应， θ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φ_{pt} 为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且聚类到县级层面。系数 β_1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反映了就业帮扶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影响。

为了检验采用强度 DID 方法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将（2）式中的时间虚拟变量 $Post_t$ 替换为年份虚拟变量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 Y_{it} = \beta_0 + \sum_{k=-5}^{-2} \beta_k Year_t^k \times Shock_c + \sum_{k=0}^2 \beta_k Year_t^k \times Shock_c + \mathbf{X}'\boldsymbol{\gamma} + \alpha_i + \theta_t + \varphi_{pt} + \varepsilon_{it} \quad (3)$$

(3) 式中： $Year_t^k$ 为时点虚拟变量，表示就业帮扶冲击的相对时间。由于模型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为避免完全共线性，本文选择冲击的前一年作为基期。因此，(3) 式中的时点虚拟变量被分为两组，一组用来检验冲击发生前的平行趋势 ($-5 \leq k \leq -2$)；另一组用来考察冲击发生后的动态效应 ($0 \leq k \leq 2$)。其他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就业帮扶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影响

表 4 汇报了就业帮扶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1) 列、(3) 列、(5) 列和 (7) 列未引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对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转移性收入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926、-1.004、3.927 和-0.851，且仅对人均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其他估计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相较于 (1) 列、(3) 列和 (7) 列，(5) 列的 R^2 最接近 1，拟合度最高，表明本文模型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方程的解释力度较强。同时，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与未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就业帮扶冲击仅对人均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其他类型收入未产生明显影响。实际上，就业帮扶的核心目标就是为帮扶对象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通过提高其非农就业收入来缓解贫困（平卫英等，2021）。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1。

已有研究表明，就业帮扶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职业技能培训以及资金支持，显著提升了贫困和脱贫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质量（Rupert and Zanella, 2015；Bandiera et al., 2017；张鹏龙等，2024）。这些帮扶措施不仅直接增加了帮扶对象的就业收入，也为其长期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当就业帮扶显著提高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后，帮扶对象的家庭总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导致其失去获取部分政府补贴或社会救助的资格，形成所谓的“福利悬崖”效应，从而可能削弱转移性收入的补充作用。因此，需要加快建立以就业帮扶为核心、其他帮扶举措并重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体系。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经营性收入		人均财产性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转移性收入	
	(1)	(2)	(3)	(4)	(5)	(6)	(7)	(8)
就业帮扶冲击	-0.926 (1.648)	-0.692 (1.464)	-1.004 (1.274)	-1.415 (1.212)	3.927** (1.754)	2.772* (1.408)	-0.851 (1.063)	-0.206 (0.791)
户主年龄		0.026 (0.017)		-0.072*** (0.018)		0.147*** (0.018)		-0.030* (0.016)
户主年龄平方		-0.011 (0.016)		0.065*** (0.016)		-0.153*** (0.017)		0.046*** (0.014)
户主性别		-0.386*** (0.039)		0.166*** (0.043)		-0.175*** (0.025)		0.174*** (0.028)
户主文化程度		-0.020 (0.013)		-0.015 (0.012)		0.089*** (0.011)		-0.025*** (0.009)

表 4 (续)

户主健康状况	0.002 (0.019)	-0.052** (0.026)	0.217*** (0.017)	-0.147*** (0.015)
家庭人口数	0.037*** (0.012)	-0.059*** (0.011)	0.275*** (0.035)	-0.109*** (0.012)
家庭耕地面积	0.406*** (0.071)	0.021 (0.036)	0.165*** (0.032)	0.170*** (0.035)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0.636 (0.473)	0.461 (0.680)	0.074 (0.494)	0.411 (0.364)
县域户籍人口数	1.462 (1.340)	0.445 (1.737)	1.935 (1.991)	-2.455** (0.935)
县域第二产业占比	1.253 (1.268)	-0.609 (1.999)	-4.932*** (1.869)	1.282 (1.147)
县域第三产业占比	0.800 (1.132)	-2.249 (1.888)	-3.048 (1.973)	1.437 (1.084)
县域财政自给率	-0.968 (0.758)	0.240 (0.839)	-0.415 (0.632)	-0.877 (0.538)
县域金融发展水平	-0.168 (0.302)	0.268 (0.478)	-0.254 (0.279)	0.308 (0.289)
县域产业规模化	-0.418*** (0.114)	0.034 (0.183)	0.329 (0.244)	-0.131 (0.111)
县域储蓄水平	0.173 (0.416)	0.279 (0.713)	-0.914 (0.795)	0.807* (0.410)
县域社会福利水平	-0.005 (0.051)	-0.167** (0.082)	-0.004 (0.049)	0.023 (0.039)
县域教育水平	-6.390 (4.523)	-0.438 (7.877)	8.734 (7.107)	3.509 (3.483)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6072814	16072814	16072814	16072814
R ²	0.623	0.625	0.746	0.68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强度 DID 方法进行因果关系识别。强度 DID 方法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发生前的关键变量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此，本文参考 Liu and Qiu (2016) 的做法，基于 (3) 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前，核心自变量不显著^①。

^①估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图 1。

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冲击前没有显著差异。

（三）稳健性检验 2：安慰剂检验（假设冲击年份提前）

不可观测因素或随机波动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此，本文将冲击年份提前。具体而言，本文分别将冲击年份提前至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并基于（2）式重新进行估计。如果就业帮扶冲击变量在这些假设的冲击年份及之后不显著，则通过安慰剂检验，表明估计结果未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或随机波动的严重影响。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核心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①。这意味着，在假设的冲击年份及之后，就业帮扶未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产生差异性影响，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3：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处理组）

遗漏变量问题是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排除遗漏变量问题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研究（La Ferrara et al., 2012; Cai et al., 2016），通过随机抽取处理组方式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具体而言，本文在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原始处理组数量相同的样本作为“伪处理组”，并进行回归，然后将这一过程重复进行 200 次。该做法可以检验在不存在真实政策冲击的情况下，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影响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所有估计系数均小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②。这表明，在随机条件下，就业帮扶的政策效果被显著高估的可能性较小。t 值的绝对值分布显示，只有 7 个 t 值的绝对值大于 2，远低于显著性水平所要求的临界值。这表明，随机抽取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通过，遗漏变量问题未严重干扰本文估计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4：排除其他帮扶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除就业帮扶外，帮扶政策还包括产业帮扶和教育帮扶等。这些帮扶政策可能对帮扶对象的家庭收入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排除其他帮扶政策的干扰，本文在（2）式基础上引入产业帮扶和教育帮扶的强度 DID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是否稳健。这两个帮扶变量的构建方式与就业帮扶冲击变量的构建方式类似，为时间虚拟变量和冲击指标的交互项。其中，冲击指标构建与（1）式类似，区别在于将就业帮扶资金替换为产业或教育帮扶资金。估计结果显示，引入产业帮扶冲击和教育帮扶冲击等相关控制变量后，就业帮扶冲击对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③。这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并非由其他帮扶政策引起。

五、机制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就业帮扶的稳定性

就业帮扶在确保帮扶对象收入稳定、降低返贫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为帮扶对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避免家庭收入出现剧烈波动。本文以收入波动性为因变量，基于（2）式分析就业帮

^①估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3。

^②估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图 2。

^③估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4。

扶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波动性的影响。考虑到波动方向所代表的含义截然不同，不加以区分可能会混淆波动的真实作用，因此，本文将收入波动性区分为收入上行波动和收入下行波动，并进行分组回归。其中，收入波动以家庭层面当年收入和上一年收入差值与上一年收入的比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表5报告了就业帮扶冲击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波动性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仅对收入下行波动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就业帮扶在降低帮扶对象家庭收入下行波动、增强其抵御负面冲击能力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2。

就业帮扶通过提供公益岗位、职业技能培训、务工补贴等多元化的扶持措施，积极为帮扶对象创造就业机会，拓展其增收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就业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这些就业帮扶措施稳定了帮扶对象的基本收入，能够有效增强其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自我维持与调节能力（郭倩等，2021；陈菲菲等，2022）。当家庭遭遇劳动力流失、外部就业市场收缩、突发性健康风险等不可控因素时，就业帮扶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持有助于对冲这些因素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帮扶对象再次陷入贫困状态或被边缘化，进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持。

表5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就业帮扶的稳定性

变量	人均工资性收入波动性			
	收入上行波动		收入下行波动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就业帮扶冲击	-0.249	0.329	-0.226*	0.1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6742730		1040306	
R ²	0.317		0.595	

注：①*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4（6）列。

（二）作用机制检验：就业帮扶的开发性

就业帮扶旨在助力帮扶对象打破就业壁垒，帮助其摆脱对小农经济的依赖，实现家庭收入的自主增长。本文使用非农就业参与以及非农就业时长变量作为因变量，分析就业帮扶对帮扶对象非农就业的影响。其中，非农就业参与以受访者当年是否务工（务工=1，不务工=0）来测度，非农就业时长则以受访者当年的务工月数来衡量。表6汇报了就业帮扶冲击对帮扶对象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对非农就业参与和非农就业时长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53和2.685，且对非农就业参与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就业帮扶发挥开发性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来创造就业机会，或是通过培训提高帮扶对象的就业能力，以促进未就业者进入就业市场，而非延长已就业帮扶对象的工作时间。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3。

实际上，就业帮扶的开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就业岗位，为帮扶对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张鹏龙等，2024）。具体来说，政府通过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和创业补贴等方式，提高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二是通过技能培训或资金支持提升帮扶对象的就业能力，使未就业者有能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卫英等，2020）。例如，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如农技培训、电商培训和手工艺培训等，以提高帮扶对象的就业能力。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就业帮扶的开发性

变量	非农就业参与		非农就业时长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就业帮扶冲击	0.353*	0.187	2.685	2.0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37653149		37653149	
R ²	0.741		0.721	

注：①*表示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表中的回归使用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替代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家庭层面和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同表 4（6）列，同时以个体固定效应代替家庭固定效应。

（三）进一步分析：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通常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等问题。因此，本文在（2）式基础上引入就业帮扶冲击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交互项，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表 7（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交互项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负向影响帮扶对象的人均工资性收入。这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越强。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4。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会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以缓解贫困问题并推动经济增长。例如，中央政府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优化财政支持机制等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就业帮扶工作的开展，从而推动帮扶对象增收。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就业机会有限。就业帮扶能够有效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显著提高帮扶对象的家庭收入。相较之下，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成熟，就业帮扶等政策的边际效应可能较小（陈慧卿等，2021）。

（四）进一步分析：基于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就业帮扶政策的效果受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在（2）式基础上分别引入就业帮扶冲击与县域第二产业占比、县域第三产业占比的交互项，以考察产业结构对就业帮扶增收效应的作用。表 7（2）列报告了相关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就业帮扶冲击与县域第二产业占比的交互项不显著，但与县域第三产业占比的交互项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正向影响帮扶对象的人均工资性收入。这表明，地

区的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越强。这与张萃（2011）以及单德朋（2012）的发现一致。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4。

实际上，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过程中，出现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使得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力的上，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少。然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丰富，涵盖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科技服务、数字经济等）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均较大，能够为帮扶对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助于帮扶对象增收脱贫。

表 7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工资性收入			
	(1)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就业帮扶冲击	43.310**	21.490	-25.080	15.090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0.215	0.499		
就业帮扶冲击×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2.961*	1.576		
县域第二产业占比			-4.965**	1.922
就业帮扶冲击×县域第二产业占比			24.110	15.270
县域第三产业占比			-2.979	2.035
就业帮扶冲击×县域第三产业占比			45.740*	23.500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6072814		16072814	
R ²	0.750		0.750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除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县域第二产业占比和县域第三产业占比外，其他控制变量同表 4（6）列。

（五）进一步分析：就业帮扶具体措施的增收效应

正如上文所述，就业帮扶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等方式，提升帮扶对象的就业能力，促进其获得稳定的非农就业收入，从而助力帮扶对象增收（张鹏龙等，2024）。本文在（2）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提供公益岗位、技能培训和务工补助等就业帮扶具体措施对帮扶对象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探究就业帮扶具体措施对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明晰就业帮扶发挥增收作用的路径，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精准的参考。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就业帮扶具体措施冲击变量的构建方式与（1）式类似。这一做法既有助于确保变量设定的逻辑延续性，使研究设计严谨一致，又增强了结果的可比性与稳健性，使分析结果更具可信度。表 8 报告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公益岗位冲击、技能培训冲击和务工补助冲击对人均工资性收入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4.322、13.190 和 5.086，

且仅有公益岗位冲击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就业帮扶的三项具体措施中，仅有提供公益岗位在提升帮扶对象人均工资性收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公益岗位主要针对就业困难群体，为其提供相对直接的工作机会。这些岗位不仅促进了帮扶对象的劳动参与，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工资性收入（胡振通和王亚华，2019）。部分技能培训项目未能充分对接市场需求，导致受训者在完成培训后，仍然面临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例如，部分培训内容较为基础或过时，难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导致技能培训的增收作用不强。务工补助通常用于支持外出务工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但补助金额有限，可能只在短期内降低务工成本，而未能对帮扶对象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而务工补助对这两方面的直接影响都较弱。这导致务工补贴的增收作用不强。

表 8 就业帮扶具体措施的增收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工资性收入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公益岗位冲击	4.322***	1.384				
技能培训冲击			13.190	8.657		
务工补助冲击					5.086	3.89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8958108		8820501		6653120	
R ²	0.742		0.738		0.742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4（6）列。

（六）进一步分析：就业帮扶政策的瞄准性

就业帮扶充分考虑脱贫人口的返贫原因，并“按需制宜”地采取了针对性帮扶措施，推动就业受阻的帮扶对象增收。本文基于（2）式分析就业帮扶冲击对不同返贫原因的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的影响。根据返贫原因，表 9 分组估计了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对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和缺资金而返贫的帮扶对象，就业帮扶冲击对其人均工资性收入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3.001 和 1.861，且变量均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因疾病、残疾、教育负担、缺技术和缺劳力而返贫的帮扶对象，就业帮扶冲击对其人均工资性收入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就业帮扶具有良好的政策瞄准性，能够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或资金缺乏的困难群体提供有效支持，助力其参与就业，防止返贫。

一方面，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和缺资金而返贫的家庭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就业激励和启动资金。公益性政府服务采购（胡振通和王亚华，2019）、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技能培训相结合（刘斯文，2020）、创业扶持与企业税费优惠相配合（王轶和刘蕾，2022）等方式，可以为内生动力不足和就业条

件受限的帮扶对象提供合适的就业渠道，同时也可以促进本地产业发展，实现就业和产业的双向帮扶。另一方面，因健康状况、身体条件、教育负担、技能缺乏或家庭劳动力不足而返贫的家庭面临的是“结构性约束”。即便有就业机会，这些家庭也难以稳定参与劳动。换言之，这些家庭需要医疗保障、教育资助和社会救助等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来破解这些“结构性约束”，而非仅仅需要就业帮扶。这种差异凸显了就业帮扶的政策瞄准性：精准作用于存在就业障碍的群体，对症解决制约其就业的关键问题，在目标群体上有明确聚焦。而且，由于针对的是存在就业障碍的帮扶对象，就业帮扶的增收作用往往强于其他帮扶项目（罗良清等，2022）。

表9 就业帮扶政策瞄准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工资性收入						
	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1)	缺资金 (2)	疾病 (3)	残疾 (4)	教育负担 (5)	缺技术 (6)	缺劳力 (7)
就业帮扶冲击	3.001** (1.361)	1.861** (0.706)	1.648 (1.493)	1.942 (1.665)	1.301 (0.982)	1.335 (1.130)	-0.476 (1.35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一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6141	16736	54745	11072	11307	10754	9430
R ²	0.759	0.764	0.785	0.792	0.682	0.696	0.807

注：①**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4（6）列；④样本区间为2015—2020年。

六、结论与启示

就业帮扶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2015—2023年农业农村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抽样数据，考察就业帮扶的增收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帮扶能够显著促进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就业帮扶通过稳定性和开发性来提高帮扶对象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就业帮扶的增收效果越好。而且，第三产业发展是强化就业帮扶政策效果的重要助力，通过发展第二产业来强化就业帮扶的政策效果可能面临效能不足的问题。在就业帮扶的具体措施中，仅有提供公益岗位展现出显著的增收效果。同时，就业帮扶表现出良好的政策瞄准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同步强化帮扶对象返贫致贫动态监测与帮扶。应建立健全就业需求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掌握帮扶对象的就业状况和需求，继续提升就业帮扶的瞄准性。同时，政府需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的合作，建立劳动力供需信息平台，确保就业信息的畅通与就业供需匹配，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和就业岗位。其次，建立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体而言，要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长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同时，加强对帮扶对象的跟踪服务，及时了解其就业稳定性，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强化帮扶对象增收的稳定性。最后，因地制宜地实施就业帮扶。鉴于第三产业对就业帮扶增收效应的积极影响，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服务业、旅游业、电子商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提供多元化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帮扶对象就业。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相结合的帮扶方式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 1.陈菲菲、张祎彤、仇焕广，2022：《“挪穷窝”后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基于疫情冲击下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业治理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第48-59页。
- 2.陈慧卿、陈国生、魏晓博、彭六妍、张星星，2021：《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第3期，第184-191页。
- 3.龚沁宜、成学真，2018：《数字普惠金融、农村贫困与经济增长》，《甘肃社会科学》第6期，第139-145页。
- 4.郭倩、廖和平、王子羿、刘愿理、李涛，2021：《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地理科学进展》第2期，第232-244页。
- 5.韩华为，2019：《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人口学刊》第6期，第89-102页。
- 6.韩佳丽，2019：《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的路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第12期，第43-52页。
- 7.胡振通、王亚华，2019：《公益岗位互助扶贫模式助力脱贫攻坚战：基于山东乐陵的实地调研》，《农业经济问题》第10期，第121-131页。
- 8.黄薇、曹杨，2022：《常态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反福利依赖的视角》，《经济研究》第4期，第172-190页。
- 9.黄一诺、路之纤、余可欣、李国平、刘慧迪，2022：《精准扶贫背景下建档立卡脱贫户增收效果评估》，《资源科学》第9期，第1891-1904页。
- 10.林嵩、谷承应、斯晓夫、严雨姗，2023：《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3期，第40-58页。
- 11.刘斯文，2020：《“精准扶志扶智”：缓解脱贫地区返贫之行动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15期，第120-123页。
- 12.刘天平、郭健斌、孙凯，2024：《西藏脱贫户脱贫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户职业分化视角》，《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32-142页。
- 13.罗良清、平卫英、单青松、王佳，2022：《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总结：扶贫政策能够实现有效增收吗？》，《管理世界》第2期，第70-83页。
- 14.闵继胜、陈靖雯，2024：《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农民增收了吗？——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第4期，第94-108页。
- 15.平卫英、罗良清、张波，2020：《就业扶贫、增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四川秦巴山区与藏区调研数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第155-174页。

- 16.平卫英、罗良清、张波, 2021:《我国就业扶贫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管理世界》第7期,第32-43页。
- 17.钱忠好、王兴稳, 2016:《农地流转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第39-50页。
- 18.单德朋, 2012:《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方法的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第106-112页。
- 19.孙顶强、刘丹、杨馨越, 2024:《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能否促进农户增收——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23-43页。
- 20.王轶、刘蕾, 2022:《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第44-62页。
- 21.肖萌、李飞跃, 2017:《工作还是依赖?——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1期,第102-112页。
- 22.谢先雄、赵敏娟、蔡瑜、邓悦, 2020:《农地休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基于西北休耕试点区1240个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62-78页。
- 23.殷江滨、李尚谦、姜磊、程哲、黄晓燕、路改改, 2021:《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地理学报》第6期,第1471-1488页。
- 24.岳希明、罗楚亮, 2010:《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缓解贫困》,《世界经济》第11期,第84-98页。
- 25.张萃, 2011:《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第51-63页。
- 26.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 2024:《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管理世界》第3期,第127-152页。
- 27.张世伟、张君凯, 2020:《政府培训、正规就业与农民工劳动报酬》,《人口学刊》第6期,第101-112页。
- 28.赵海, 2013:《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率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1期,第40-45页。
- 29.Bandiera, O., R. Burgess, N. Das, S. Gulesci, I. Rasul, and M. Sulaiman, 2017, "Labor Markets and Poverty in Village Econom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2): 811-870.
- 30.Cai, X., Y. Lu, M. Wu, and L. Yu, 2016,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 away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3: 73-85.
- 31.La Ferrara, E., A. Chong, and S. Duryea, 2012,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4(4): 1-31.
- 32.Liu, Q., and L. D. Qiu, 2016,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Patent Fil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3: 166-183.
- 33.Rupert, P., and G. Zanella, 2015, "Revisiting Wage, Earnings, and Hours Profil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2: 114-130.

Income-Enhancing Effects of Employment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2015–2023 Tracking Survey of 125 Poverty-Alleviated Counties in China

JIANG Wei¹ YANG Yang² XU Shu¹ QIU Tongwei³

(1.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Rural Revitalization Monitoring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ummary: Ensuring that rural populations do not experience large-scale return to poverty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baseline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targeted and stratified assistance, the provision of development-oriented support to labor-capable groups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Employment support, as a ke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suppor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poverty reduction achievements in China. Unlike simple cash transfers, employment support enhances rural laborers' employ ability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through skill training, job matching, and industrial linkage, effectively achieving a shift from transfusion-style assistance to self-sustaining development capacity. Employment support not only strengthens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capacity but also facilitates labor mo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sta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reby enhancing households' resilience to poverty recurrence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Consequentl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mployment support on household income is of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levance for preventing return to poverty and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outcomes.

This study utilizes sample data from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panning 2015–2023 and constructs an intens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using variations in county-level fiscal expenditure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support on both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beneficiary households' incomes. It furth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mployment support through two dimensions—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and assesses the heterogeneous income effects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by providing insights for policy optimiz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mployment suppor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wage income among beneficiaries.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employment support enhances wage income through both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sec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inforcing policy effects, whereas relying solely on the secondary sector may yield limited results. Among specific measures, only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 positions demonstrates a significant income effect. Employment support also exhibits good policy targeting. Overall, employment support plays a vital role in raising wage incom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or even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mployment support, not only to consolidate poverty reduction achievements and prevent return to poverty, but also to promote sustainabl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polici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with precise and differentiated support strategies that design and implement employment suppor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neficiaries, so as to maximize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apacity and income of rural laborers.

The primary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wofold. First, by identifying the income effects of employment support through variations in fiscal expenditure, it provides new evidence and perspectives for policy adjustment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fiscal resources. Second, based on 2015–2023 data,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of employment support policies sinc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offering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optimizing post-transition policies to effectively link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the five-year transition period.

Keywords: Farmers' Income Growth; Employment Support;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I38; J21; O15

(责任编辑：光明)